

社会学家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

——基于外文文献的考察

邹进文 夏文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中国社会学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由西方舶入, 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 因此近代中国社会学家在关注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较多关注中国经济问题。他们发表的外文论著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经济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 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对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工问题、都市生计问题及人口和移民问题等做了深入、系统研究。相比经济学家侧重于讨论资源配置效率, 社会学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视野则更为开阔, 为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 社会学家; 近代经济问题; 外文文献

中图分类号: F09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30(2024)03-0151-10

社会学与经济学存在密切的联系, 特别是 19 世纪中叶兴起的经济社会学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 将经济问题视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之内的现象, 拓展了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西方许多学者如马克斯·韦伯既是社会学家, 也是经济学家。民国时期, 中国诸多社会学家关注中国经济问题, 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这些文献, 尤其是外文文献较少被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关注。本文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了系统地整理与研究, 以拓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野, 加深对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的理解。区别于当前学术界主要利用中文文献进行的研究^①, 本文基于外文文献, 从全球视角梳理了中国近代社会学家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的研究成果。

一、社会学家视野下的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 其在工业化过程中引发的一系列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亦广为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所关注。这些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乡村的经济生活、经济结构、产权及市场网络等, 扩展了中国近代乡村经济研究的视野。代表性外文文献有陶孟和与梁

收稿日期: 2024-03-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国时期太平洋国际学会有关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的文献整理与研究”
(21AJL001)

作者简介: 邹进文(1964—), 男, 湖南益阳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夏文娟(1985—), 女, 湖南益阳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宇皋合著的《中国城镇与乡村生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及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

1. 陶孟和与梁宇皋合著的《中国城镇与乡村生活》

陶孟和(L.K.Tao, 1887—1960年), 1906年作为官费生赴日本留学, 1909年回国, 1910年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社会学, 1913年获学士学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于1895年由英国工人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成员创立。受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陶孟和在留学期间致力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 并与低一年级的同学梁宇皋(Y.K. Leong, 1888—1963年)编纂了《中国城镇与乡村生活》(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该书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政治研究丛书”中的《社会学专刊》第四种, 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 1923年再版。2015年该书被列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根据陶孟和1913年在英国《社会学评论》(The Sociological Review)上发表的《中国的家族制度》(The Family in China)一文扩充而成。该书基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背景, 以社会学的方法刻画了中国当时乡村和城市的社会结构。著作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梁宇皋撰写的“中国村庄的内部运行”, 内容包括村庄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祠堂和村庙, 描述了中国乡村生活、家庭、宗族和乡村社会。第二部分为陶孟和撰写的“城镇管理”, 内容包括社会组织、城市社会和中国佛教的大众化, 侧重于中国城镇的管理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城乡格局基本一致, 城镇不过是一个扩大的村庄或村庄群, 所以两部分的内容存在一些重复。该书是以社会学观点研究中国社会生活的最早一部学术著作, 其中涉及经济的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国的土地制度、人口过剩及家族制度面临城镇化挑战等问题。陶孟和的老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霍布豪斯(L.T.Hophouse)为该书作序, 高度评价该书, 特别强调该书对于西方的价值, 认为“要充分理解一个政治和商业上对西方日益重要的大帝国, 中国人的观点是必不可少的”^[1]。

2.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

费孝通(Fei Hsiao Tung, 1910—2005年), 1936年赴英国留学, 于1938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费孝通接受导师弗思(Raymond William Firth)的建议, 决定以他出国前在其家乡开弦弓村的调查成果为基础撰写博士论文。不久, 弗思的导师——人类学家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直接指导费孝通的论文写作。1938年春, 费孝通通过论文答辩, 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开弦弓: 一个中国村庄的经济生活》(Kaihsienkung: Econo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1939年该论文由英国伦敦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和纽约达顿(Dutton)出版社同时出版, 书名为《中国农民生活: 扬子江流域乡村生活的田野调查》(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1986年该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书名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以下简称《江村经济》)。2001年该书被收入“商务印书馆文库”, 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江村经济》在人类学学术发展史上改变了人类学只研究未开发文化的轨迹, 摆脱了人类学“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倾向^[2], 对处于文化急剧变迁中的中国乡村社区做了生动描述和深入研究。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英文版序言中评价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并认为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英国历史学家E.丹尼森·罗斯认为“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2](P1-2)}。由于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 费孝通于1981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江村经济》是一部社会学著作, 同时也是一部经济学著作, 它广泛探讨了江村产权、手工业(蚕业)发展、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 是一部从微观的视角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江南农村经济问题的著作。该书分别于1943年和1946年在西方再版其英文版, 该书的出版和再版, 都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例如, 汉学家、俄罗斯学者史禄国(S. Shirokogoroff)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1939年第4卷第1期,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约翰·F.埃布雷(John F. Embree)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0年第46卷第2期,美国耶鲁大学的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40年第42卷第1期,华裔汉学家许烺光(Francis L.K. Hsu)在英国的《人类》(Man)1940年第40卷,汉学家费正清(J. K. Fairbank)在《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40年第10卷第2期,等等,发表了对这部著作的评论文章。

费孝通去世后,西方学术界仍有学者关注其博士论文。2013年1月,亚特兰蒂斯大学(University of Atlantis)的芭芭拉(Barbara Celarent)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第118卷第4期上发表了对费孝通博士论文的长篇评论文章,介绍其生平、学术成就,特别是其博士论文的学术贡献,认为其博士论文“契合了20世纪初人类学的经典主题:主亲属结构、财产、亲属关系扩展、家庭与村落、生计、职业分化、工作性质、农业、土地使用权、丝绸业、市场和金融”,并指出该书丰富的描述和细节的重要性^[3]。

《江村经济》一书的研究风格和观点影响着费孝通的学术人生。晚年的费孝通两度深入江村调研,探索东方农业大国的农村复兴之路,他提出的大力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宏论均可从《江村经济》中有关大力发展农村工业的论述中找到思想的渊源。

《禄村农田》是《江村经济》的续编。1938年,费孝通在英国完成博士论文后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继续开展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他计划选择云南的一个村庄进行调研,以便与他在沿海地区调查过的江村作比较研究。经当时在国民政府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持农村合作事业研究的王武科的介绍,他确定了云南禄丰县的禄村(今禄丰县金山镇大北厂村)为调查对象。第一次调查从1938年11月15日到12月23日。1939年上半年,他将调查材料整理成文。1939年8—10月,费孝通与其学生张之毅第二次赴禄村实地调查,一方面核实他已有的论据,另一方面考察近一年来禄村经济的变迁情形。结合这次复查的结果,他重新整理了调查文稿,于1940年1月完成工作。此后书稿几经修改,作为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报告,收入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乙集第一种,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禄村农田》。1944年,美国政府以同盟国的名义邀请中国各大名校教授访问美国,费孝通应邀赴美。在美国访问一年间,他将《禄村农田》翻译成英文,将其与张之毅所著的《易村手工业》《玉田农业和商业》两部农村调查报告一起编成《土地束缚下的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一书,并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支持和资助下^②,于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收入英国开根·保罗(Kegan Paul)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199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文版,书名为《云南三村》。2006年,该书中文版被列入“社会学人类学论丛·‘魁阁’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两书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两种不同的农村社会,当时的江村已经受到了现代工商业的影响,以丝织业为代表的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处于西南边陲的禄村则全然不同,社会经济发展仍处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阶段。当时的禄村几乎完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事业,因此在《禄村农田》中,费孝通主要考察了禄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和农民的生计。

1941年,费孝通的《禄村农田》油印本刊印以后,同年,社会学家吴景超在《新经济》第6卷第9期发表对该书的评论文章,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在代表着中国的社会学,走上了一条新的途径。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国的社会学者的主要工作,在于介绍西洋的理论。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论与方法,到中国的社会里去做实地研究的,可谓绝无仅有。现在费先生带领着一班青年的社会学者,在云南切实的做了许多实地研究的工作……这种风气的提倡,一定会替中国的社会学奠定稳固的基础,盖起庄严的建筑。”^[4]

该书与张之毅所著的《易村手工业》《玉田农业和商业》两部农村调查报告一起编成的《土地束缚下的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一书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诸多学者对其发表了评论文章。例如,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美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J. Lossing Buck)在《远东调查》(Far Eastern Survey)1945年第14卷第24期,纽约城市大学的修武(C.W. Shuh)在《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

ety)1946年第10卷第4期,芝加哥大学的埃弗雷特·C·休斯(Everett C. Hughes)在《土地与公用事业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Land &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1946年第22卷第2期,芭芭拉(Barbara Celrent)在《美国社会学杂志》2013年第118卷第4期,等等,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文章。

3. 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

杨懋春(Martin C. Yang, 1904—1988年),从齐鲁大学毕业后,于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攻读乡村社会学硕士学位,师从杨开道。1931年参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1937年受聘于齐鲁大学社会系。1939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乡村社会学系留学,于1941年获得硕士学位、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受邀至哥伦比亚大学,参与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主持的“中国乡村文化”研究工作,1945年将研究成果整理为“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一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200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将其选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书名为《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该书被译成多国文字,为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

《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以作者的故乡山东胶东半岛的台头村为研究对象。区别于一般社会学著作,从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教育等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入手研究,该书主要以初级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起点,然后扩展到次级群体中初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扩展到一个大地区中次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从产业结构、消费、乡村市场和未来经济发展等方面介绍了台头村的经济状况。

该书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该书出版的当年就得以再版,又于1947年、1959年多次再版。该书出版时,时任美国农业部推广部主任的威尔逊(M. L. Wilson)为该书撰写导言,表示该书是“在完全贯通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把中国乡村生活各方面总合起来加以描述的第一本书”。威尔逊认为杨懋春的研究具有世界性意义,“对世界范围内乡村条件的改善意义非常重大”^[5]。杨懋春的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为该书撰写序言,高度评价该书的学术贡献,认为其是“最成功的研究之一”^{[5](P5)}。另外,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玛格丽特·帕克·莱德斐尔德(Margaret Park Redfield)在《美国社会学杂志》1946年第51卷第5期,斯坦福大学的理查德·T·拉皮埃(Richard T. LaPiere)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1946年第19卷第2期,等等,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文章。

4. 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

张之毅(1914—1987年),1937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毕业后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加入费孝通主持的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工作站,与费孝通一道深入禄丰县禄村和易门县易村(今为禄丰县恐龙山镇九渡村)从事社会学调查研究,撰写了《易村手工业》一书。此外,他还于1940年和1941年深入云南玉溪县玉村调查,撰写了《玉村农业和商业》一书。

费孝通的《禄村农田》聚焦于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经济,在禄村调查研究的同时,他还计划在云南昆明附近寻找一个手工业发达的乡村展开调查研究。1939年10月,费孝通和张之毅经人介绍,选定易村作为调查对象,在易村进行了十余天的调研。次月,张之毅再次返回易村,展开了近一个月的调查。基于这两次调研,张之毅写出《易村手工业》一书,介绍了易村土地的利用、农业劳动力的过剩、农业资本的生息、村民生计的维持及农业之外从事的各种事业(织篾业和造纸业)。1941年9月,费孝通为该书撰写了长篇序文。1944年,该书作为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合作社会学研究报告,收入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乙集第二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该书编入《云南三村》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玉村是一个靠近云南玉溪县城的村庄,玉溪县城是云南中部的一个传统商业中心。在土地制度上,玉村是从禄村到江村的过渡形式,在农业经营上具有靠近城镇的菜园经济的特点,在发展上正处在传统经济开始被现代经济影响的初期阶段。可以说,它是一个不同于江村、禄村和易村经济类型的村庄。张之毅对玉村农村经济的调查是在1940年和1941年进行的。由于玉村离云南大学社会学研

究室的所在地呈贡县较近,且交通方便,因此,初步报告《玉村农业和商业》形成后,张之毅再次前往玉村深入复查,以进一步提高调查报告的质量。该报告汇报了玉村农业耕作和蔬菜种植、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村民织布和养鸭、家庭消费和积累、农村人口的外流、传统社会中财富的猎取、商业资本的活动和资金利用等方面的内容。该报告与《江村经济》《易村手工业》构成了费孝通研究团队有关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三部曲”。1943年,该报告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理事会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张之毅对《玉村农业和商业》的旧稿作了大幅度修改^[6]。由于张之毅于1987年6月去世,书稿后由费孝通校阅,收入《云南三村》一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

二、社会学家视野下的中国工业

近代中国,社会学家亦关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试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劳工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这方面的外文代表作有程海峰的《中国工业化与劳工问题》一文和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一书,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工问题。

1. 程海峰的《中国工业化与劳工问题》

1937年,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Institut für Weltwirtschaft an der Universität Kiel)^③的《世界经济杂志》(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于第45卷第2期,专门为中国工业化做了一期专题论文。该专题由何胡曼博士负责,收录了多篇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和官员探讨中国工业化的论文,其中包括程海峰的《中国工业化与劳工问题》一文。

该辑文章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中德两国协力推进中国工业化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因受凡尔赛协定束缚,失去了在华特权,中德经贸关系趋向平等。失去殖民地的德国将中国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投资、产品销售和原材料供应的重要市场,而南京国民政府将德国视为实现工业化的重要资金、技术的引进国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效仿国。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德国的经贸往来和学术交流一度非常密切。1930年3—6月,全德工业联合会中国考察团访问了中国若干省份和13个城市,以获得中国经济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并与中国政府探讨可行的合作项目。次年1月,全德工业联合会成立了“中国研究学会”,目的是“研究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并与所有相关的团体合作,做必要的准备,以便……德国工业独享存在于中国市场显露出的机会”^[7]。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加紧实施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国家工业化计划,以提升国防工业水平。1936年,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在德国顾问帮助下制定了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获得国民政府的批准。该计划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大跃进”计划,试图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国中南部建立起工业和原材料基地,为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以抵御日本的入侵。德国公司为这些计划提供全套工厂设备、技术支持和信用担保,而中国以德国亟需的钨、锑等战略矿产品和其他出口产品偿付贷款。193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率代表团访问德国。尽管此次访问的军事目的强烈,但对推动中德工业交流和经贸往来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

中德两国协力推进中国工业化引起了关注世界经济动向的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的关注,其主办的《世界经济杂志》刊登有关中国工业化的系列论文,目的是为德国学术界和商界提供了解中国工业化的信息,以便德国学术界研究中国工业化以及德国商界参与中国工业化。这些论文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西方杂志发表有关中国工业化的系列成果,扩大了中国学术界在西方的影响力。

程海峰(Cheng Hai-Fong, 1903—?)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后,于1930年回国,任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秘书。1933年任实业部中央工厂检查处检查科长,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局长。作为中国劳工问题专家,程海峰撰写的《中国工业化与劳动问题》(Die arbeitsmäßigen Voraussetzungen für eine weitere Industrialisierung in China)一文,主要分析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工问题。他认为,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庞大人口规模提供的劳动力来推动工业化进程。尽管中国劳工具有勤奋、冷静、顺从的良好品质,但他们只适合非正规劳动,不适应机器生产;他们不仅营养不足,健康状况不佳,还缺乏教育和培训,不具备在工厂工作的条件。因此只有使中国劳工的质量和数量与中国工

业化的要求相适应,才能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以提高生活水平。

2. 史国衡的《昆厂劳工》

史国衡(Kuo-Heng Shih, 1912—1995年), 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次年转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39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40年转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45—1948年赴哈佛大学留学。1948年回国, 任职于清华大学。

史国衡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期间就受社会学家陈达指派, 与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教员苏汝江共同负责云南个旧锡业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深入个旧锡矿区调查研究矿场工人的生活、劳动情况, 获得大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39年, 他以个旧锡矿业调查资料为基础, 完成其大学毕业论文《矿山与矿工: 个旧锡矿工人生活调查报告》。1940年赴云南大学任教, 并在费孝通的指导下, 他进驻昆明郊区新创立的一个国营兵工厂进行了两个半月的深入调查, 于1942年完成《昆厂劳工》报告, 并以油印本的形式面世。1944年, 费孝通和许烺光将该报告译成英文, 题为《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国军工劳工研究》(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 A Study of Labor in Chinese War Industry)。该报告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 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并由吴文藻作序, 哈佛大学霍桑奇实验室埃尔顿·梅岳(Elton Mayo)教授撰写编者按。1946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中文版, 书名为《昆厂劳工》。

史国衡的《昆厂劳工》深受费孝通“社会学调查”思想的影响。费孝通严格区分了“社区研究”(又称社会学调查)和“社会调查”, 认为“社会调查者记录所观察的事实”“社区研究者则还要用理论来解释所见的现象”“社会调查的中心是事实社区研究的中心是理论”。社会调查方面著作的“书末多附有一套调查表格, 调查者根据这些表格在实地访问或观察, 把结果填入表内。根据这些表上的数字加以分类和统计, 就完成了调查工作”。社区研究的步骤却大不相同, “社区研究的出发点是一套已有的理论, 所谓理论是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由已有的理论发生许多相联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去考察事实, 目的是在看我们所持理论是否可以解释这些新事实, 若是不能的话就在实地观察中去寻求新的解释, 形成新的理论”^[8]。费孝通认为他在抗战时期所领导的云南乡村经济和工业化的系列调查是“社区研究”。正是基于这一思想, 费孝通学术团队在进行“社区研究”(社会学调查)前一般都会制定周密的调查方案。

《昆厂劳工》是费孝通领导的“魁阁”农村调查的延伸。1938—1942年, 费孝通所在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办公地点在云南呈贡县的魁星阁)完成了云南农村的三本调查报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魁阁学者在研究云南农村社会的过程中, 发现不少农民进入现代工厂, 这种现象在魁阁学者中引发一连串问题: “农民进入现代工厂, 最初是抱着什么打算? 进厂以后怎么样调适他们的生活? 他们个人的观点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们过去的一套积习在做工的效率和工厂管理上又引起如何的结局? 最后他们在工业建设当中, 将尽什么样的功能”^{[8](P1)}。要回答上述问题, 只有深入工厂才可以找出答案。基于上述考虑, 费孝通领导的魁阁学者团队决定进入现代工厂进行社会调查。

早在1940年8月, 费孝通就与南开大学的丁佶、清华大学的周先庚、沈同等学者制定了云南工业发展中劳工问题的研究计划, 并选定抗战时期从沿海内迁到昆明郊区的一家拥有三个分厂、500名工人的国营兵工厂开展调查。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便是该计划的成果之一。史国衡在进行昆厂劳工调查时, 费孝通给予其充分的指导, 包括确立研究问题、设计研究方案、以及解决田野调查中的具体问题等。费孝通在阅读史国衡《昆厂劳工》的书稿后, 写下了2万余字的后记, 解读和评价了该书研究的背景、方法和问题意识等。《昆厂劳工》是费孝通等学者所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乡村向城市的延伸, 是社会学家视野下的中国工业化调查名著。

该书从微观的角度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工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是中国当时少有的反映中国工业化状况的社会学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该书英文版出版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埃弗雷特·C.休斯(Everett C. Hughes)在《美国社会学杂志》1945年第50卷第5期,美国西蒙斯学院(Simmons College)的克莱德(Paul H. Clyde)在《美国政治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45年第39卷第2期,威斯康辛大学的莱斯科希尔(Don D. Lescohier)在《土地与公用事业经济学杂志》1945年第21卷第2期,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爱德华·C·卡特(Edward C. Carter)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5年第10卷第3期,等等,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文章。

该书之所以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除了该书所研究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还与劳工问题是当时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这一时代背景有关。据统计,1904—1940年,劳工问题“是美国排序第二最受欢迎的博士研究选题,共有608项注册的待完成以申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仅位于农业问题(619项)之后,其后顺次排序为经济史(567项)、会计与商业方法(533项)、货币与银行(531项)、社会问题(526项)、公共财政(459项)等”^[9]。

相较而言,《昆厂劳工》一书在国内并没有引起较多的关注,书评文章仅有《图书季刊》杂志在1946年新第7卷第3—4期发表了简介文章。当时国内学术界对《昆厂劳工》的忽视既与当时中国学术界视野尚不开阔,对新的研究动向缺乏敏感性有关,也与当时中国战时缺乏推进生产事业的经济社会环境有关。该书所论及的主题与后来中国工业化的实践相契合,对当下中国进行的工业化进程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社会学家视野下的城市生计

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引起社会巨大变迁,其中市民阶层的生计问题成为政府与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社会学家陶孟和就北平市民的生计问题作了系统、深入调查,其研究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

1926年,由美国庚款资助的中华教育基金会设立调查部,聘请陶孟和负责管理调查研究事务,陶孟和随即展开了关于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以及对北平及北平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基于此,陶孟和撰写了英文著作《北平的生计:60个家庭的经济预算分析》(Livelihood in Peking: An Analysis of the Budget of Sixty Families),由中华教育基金会调查部于1928年出版。

该书采用日记账法的调查方法,是在调查员获得的300本日用账簿(其中288本为1926年冬和1927年春两季工人家庭日用账,12本为1926年11月一整月小学教员家庭日用账)的基础上完成的20世纪20年代北平工人和小学教员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报告。该报告重点分析了北平工人家庭的收入与支出、食品消费、住宅家具与衣服消费情况,并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及若干发展中国家居民的消费水平做了比评,认为中国人的食品消费水平低下,并非中国人民为素食人民,而是由于收入太少。

该书出版的当年,J.B.C.在《太平洋事务》第1卷第4期上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该书的贡献,认为这次调查与以往的同类调查相比,资料更丰富,结果更全面,且推论出“中国劳动人民为革命和内战所付出的可怕代价”^[10]。该书中文版由南开大学的朱席儒翻译,社会调查研究所(1929年中华教育基金会将调查部改组成独立的社会调查研究所)的林颂河、王清彬和曾炳灼等校阅,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北平生活费之分析》。该书出版后,陶孟和继续开展中国生计问题研究,1931年撰写的《中国劳工生活程度》英文成果,提交给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会议。

四、社会学家视野下的中国人口与移民问题

人口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历来受到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的人口理论传入中国,1880年出版的由王凤藻所译的《富国策》中多次提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之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不断在中国人所著和所译的论著中出现。民国时期,还有中国学者在西方国家发表了有关研究中国人口和移民问题的英文论著,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社会学家陈达。

陈达(Chen Ta,1892—1975年),1916年到美国留学,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学习外交,之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社会学家奥格本(W. F. Ogburn),于192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执教于清华学校。1929年清华学校更名为清华大学后,陈达负责创办了社会学系,任系主任。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世界人口学会副会长及太平洋国际学会东南亚部负责人,是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开拓者之一。

陈达发表的有关人口问题的代表性英文著作包括《华侨: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Chinese Migr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华南移民社区》(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和《现代中国人口》(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陈达在美国《劳动评论月刊》(Monthly Labor Review)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劳动条件》(Labor Conditions)、《1917年和1920年中国五个城市的工资和工时》(Wages and Hours of Labor in Five Chinese Cities, 1917 and 1920)、《二战以来日本和中国的物价和生活成本》(Prices and Cost of Living in Japan and China Since the World War)。其博士论文《华侨: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Chinese Migr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是为美国联邦劳工统计局撰写的报告,该报告当时被美国众议院第68次会议采纳编入档案,刊登在美国劳工统计局主编的《公报》(Bulletin)杂志上,同名著作于1923年6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根据当时中国移民的各居留国(地区)的官方统计数字和相关资料,对台湾地区、荷属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英属马六甲、美属菲律宾及夏威夷、南非德兰士瓦和法国的华侨状况进行了分析,对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华侨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了考察。

《华侨: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出版后,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弗朗西斯·E.劳利(Francis E. Lawley)在《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1924年第34卷第134期,美国亚特兰大大学社会学家芭芭拉(Barbara Celarent)在《美国社会学杂志》2011年第117卷第3期,等等,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文章。截至2018年,西方学术文献征引该书140多次,是近代中国人撰写的外文学术著作中被高引的成果之一。次年,陈达将其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整理成《中国的劳动条件》(Labor Conditions in China)一文,发表在美国《劳动评论月刊》1924年第19卷第5期。

1933年,太平洋国际会议第五次年会在加拿大的班夫(Banff)召开,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国际委员会号召成员国研究各国生活程度时,把移民当作可以影响生活程度的一个重要元素,并拟定了具体的研究计划^[11]。当时作为太平洋国际学会负责人之一并兼任东南亚部主任的陈达出席了该次年会。会后,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选定移民作为具体的研究课题,由陈达负责这一项目^④。陈达所在的清华大学亦给予大力支持,“同意陈达请假一年,薪金照给,作为清华对于该会的捐款”^{[11](P313)},使得陈达有一年的时间集中精力从事该课题的研究。

从1934年夏季开始,陈达与厦门大学、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者合作,前往广东、福建华侨迁出相对集中的侨乡和华侨相对集中的马来亚、印尼、菲律宾等华侨社区进行调查,于1937年完成了《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的中文初稿,并由商务印书馆于1938年出版。随后,陈达又将该书翻译成英文,该书的英译本《华南移民社区》(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由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由别发洋行(Kelly and Walsh)于1940年出版。2011年,商务印书馆将该书列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出版。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聚焦于移民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即南洋华侨对侨乡的社会经济变迁

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该书特别注重比较研究和调查研究。在比较研究方面选定了三个社区——华侨社区(华侨迁出地,其中两个在闽南,一个在汕头)、非华侨社区(毗邻汕头华侨社区)和南洋华侨社区(华侨迁入地)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11](P6)}。在调查研究方面,该书既有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分析,也有访谈获得的信息。该书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华侨社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及其变迁”,研究大规模移民前侨乡的社会经济;第二部分为“社会变迁的一个元素:移民的影响”,从移民的角度研究其对侨乡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英译本出版以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肯尼斯·佩里·兰登(Kenneth Perry Landon)在《太平洋事务》1940年第13卷第1期,夏威夷大学的约翰·F.恩布里(John F. Embree)在《美国社会学杂志》1941年第46卷第5期,华盛顿州立学院(Washington State College)的拉法格(Thomas E. La Fargue)在《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41年第10卷第2期,等等,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文章。

1938年8月,清华大学在国民政府内政部、社会部和云南省政府支持下,成立国情普查研究所,进行人口、工农业及资源调查,为政府提供数据,为抗战总动员服务;所址设于云南呈贡县城的文庙,由陈达担任所长,李景汉任调查主任,戴世光任统计主任。该所是抗战时期清华大学设立的5个特种研究所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陈达认为,科学的人口资料,对于政府实施有效的政策大有裨益,随后国情普查研究所基于对呈贡县的人口和户籍的调查资料,完成了《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1940年油印本)和《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1944年铅印本)等研究报告。这些成果“为政府加强户籍工作,强化保甲制度和抽丁征实提供社会情报”^[12]。这次人口普查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也是“一项关于调查技术和统计方法的科学实验研究”^[13]。1944年,陈达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出席该校1946年举行的建校20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会前,他利用人口调查资料,撰写了长篇英文论文《现代中国人口》,介绍了中国在抗战大后方进行的现代人口普查试验及人事登记的方法,并讨论了中国今后应采取的人口政策。1946年,陈达在该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此篇论文,并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长篇小说全文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947年第52卷增刊。此后,该文被芝加哥大学印成专书,不仅畅销欧美,还受到了国际人口学界的广泛关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奥格朋(William F. Ogburn)为该书作序,高度评价该书,认为“其所得的资料,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调查员收集来的,这些调查员也是逐家逐户的实地访问后所得到的资料。后来还抽样抽查以核对其准确性。这种普查,还是中国破题儿第一次尝试”^[14]。

五、结语

西方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欧洲,它是欧洲工业文明演化过程中社会矛盾加剧的产物,更多关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发展问题。中国社会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舶入,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因此近代中国社会学家在关注社会问题的同时较多关注中国经济问题,他们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经济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相比经济学家侧重于从资源配置效率视角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近代中国社会学家的视野则更开阔,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近代社会学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诸多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推动了中外学术交流。

注释:

①例如,于强的《依藉〈江村经济〉构想经济学的中国学派》(《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宋猛的《江村土地的占有、继承及终结——再读〈江村经济〉》(《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张霞的《费孝通早期乡村经济思想——基于〈江村经济〉的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张莉的《一个华北乡村生活的巨变——读杨懋春先生〈一个中国村庄——山东

台头)》(《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②在费孝通将上述有关云南三村调查研究报告合集出版英文版著作之前,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就关注到其研究,并撰写了《三种类型的农村经济》(Three Types of Rural Economy)对上述三个云南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报告进行分析、总结。

③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成立于1902年,是“德国独立之最大经济研究院”,亦为国际上知名的研究世界经济的经济研究机构,关注世界经济问题及一切经济事实与动向。

④太平洋国际学会对于该项目给予了大力的支持^{[11]P11}。

参考文献:

- [1] L.K.Tao, Y.K.Leong. 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M].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2015:1.
- [2]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
- [3] Barbara, C. Reviewed Work(s): Peasant Life in China by Xiaotong: Earthbound China by Xiaotong and Zhiyi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3,118(4):1153-1160.
- [4] 吴景超.书评:《禄村农田》[J].新经济,1941,6(9):20-23.
- [5]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 [6]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
- [7] 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72.
- [8] 史国威.昆厂劳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 [9] 宋丽智.近代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1912-1949)——以《美国经济评论》为中心的考察[J].清华大学学报,2023(5):102-117.
- [10] J. B. C. Reviewed Work(s): Livelihood in Peking: An Analysis of the Budget of Sixty Families by L. K. Tao [J].Pacific Affairs,1928,4(1): 33-34.
- [11]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2] 王公,杨舰.二战时期中国的科技动员一例——清华大学抗战时期的特种研究事业[J].中国科技史杂志,2023(4):481-492.
- [13] 唐利娜,潘月,申艳芳.我国人口普查的先驱与雏形——戴世光与呈贡人口普查试验[J].社会学评论,2023(5):70-90.
- [14]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5.

Modern Chines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ists: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Foreign Language Literature

ZOU Jinwen XIA Wenjuan

(School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ociology was imported from the West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At that time, China faced the main probl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modern Chinese sociologist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China's economic issues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social issues. Their foreign literature used sociological method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nducted in-depth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rural economy and farmer life, labor issue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urban livelihood issues, and population and immigration issues. These studies have a broader perspective than economists who focus on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to study China's economic problems,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solving China's modern economic problems and have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Key words: Sociologist; Modern Economic Problems; Foreign Literature

(责任编辑:姜晶晶)